

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优势论”与“后发劣势论”

仲伟民

(清华大学 历史系, 北京 海淀 100084)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关注重点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问题,如今发展经济学已经成为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生长点。在发展经济学的诸多观点中,“后发优势论”和“后发劣势论”最为受到人们的关注。“后发优势论”强调,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直接引进资金和先进设备,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而大大节约时间成本、技术成本和制度成本,顺利实现赶超。但“后发劣势论”则强调,如果一味追求经济增长,不遵循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则,很难成功实现现代化。中国的发展经验,同时证明“后发优势论”和“后发劣势论”都有一定的合理性。这提示我们今后在现代化建设中,要遵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不能偏执或急躁冒进。

[关键词] 后发优势论;后发劣势论;现代化;制度经济学;杨小凯

[中图分类号] D50;K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25)02-0011-05

我在清华大学开了一门研究生课,这门课就叫“现代化研究”。因为现代化理论极其庞杂,而世界上各国现代化的进程更是复杂多样,所以这门课虽然开了好多年,但感觉越来越不好讲。课程内容既包括现代化的基本理论,也有一些国家现代化实践的案例。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内容,我是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艰难历程作为课程的主要线索,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阐释中国近现代史。为什么?因为中国近代遭受了无数的曲折和屈辱,现代化的实践一波三折;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突出成绩,但同样面临很多复杂艰巨的难题。现代化理论中有“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对照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中国到底是“后发优势”的典型,还是“后发劣势”的典型,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争议。我想,争议是好事,深入的讨论既可以加深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认识,也能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使中国现代化今后的发展少走一些弯路。

严格讲,原发现代性的国家只有极少数,即欧洲的一些国家。而如果按照麦克法兰的看法,真正原发性的现代化国家只有英国一个,其他欧洲国家如法国、德国等都是后发的现代化国家,美国当然更是后发的。可见,在先发的一批现代化国家中,实际上也有“先来后到者”。也就是说,即使在这些基本已经完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早被我们已经视为发达的国家当中,依然存在着“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问题。当然,现在我们一般不这么比较,即一般不再把法、德、美甚至日本看作

[收稿日期] 2025-03-03

[作者简介] 仲伟民,男,山东宁阳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经济史、全球史与跨文化交流。

是后现代化国家了,尤其在国际关系中,这些国家都是第一梯队。我们现在所说的后现代化国家,经常是指所谓第二世界甚至是第三世界在现代化建设中曾经取得突出发展成绩的一些国家。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不少国家纷纷走上现代化的进程,当然各国的发展表现五花八门,道路曲曲折折,成绩或大或小。在经过了一段发展历程之后,很多学者尤其是经济学家,对二十世纪这个现象做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一些新颖的现代化理论,比如“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理论,因为问题准、针对性强,所以这个理论后来成为发展经济学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特别值得我们骄傲的是,中国经济学家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的“后发劣势”理论就是由中国经济学家明确提出来的。

“后发优势”是由俄籍著名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于1960年代初在总结了德、意等国完成追赶、成功实现现代化基础上提出的理论。“后发”国家之所以能有“优势”,格申克龙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是“替代性”的广泛存在,即后发国家能够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选择有别于先进国家且有利于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可以模仿和直接借用,从而少走弯路;其次是可以引进先进国家的资金及技术设备,从而解决资本短缺问题,节约科研费用,缩短培养人才时间,从而在一个较高起点上推进工业化进程;第三是可以学习借鉴先进国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避免或少走弯路。在格申克龙看来,只要一个国家能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它就可以大大节约时间成本、技术成本和制度成本。^[1]“后发优势论”有很大影响,并成为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有代表性的理论。后来列维、伯利兹等从不同方面发展丰富了这个理论,其中“蛙跳”(Leap-flogging)模型就很有代表性。但是,因为这个理论有一定局限性,比如格申克龙基本没有将二十世纪中期后的后现代化国家纳入研究视野,从而导致这个理论的适用性较差,甚至经常有一些反证。

从二战结束到今天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各国现代化的成绩参差不齐,甚至可以说有天壤之别。一般而言,与欧美有血缘关系的一些国家(这里所说的有血缘关系是指与欧美有比较多的共同的文明源流,或欧美裔为主要人口的国家),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明显比较顺利,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而与欧美没有或较少血缘关系的国家,则普遍表现比较差,发展道路也更为曲折,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一些南美及非洲的一些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曾达到过较高的现代化水平,但后来遭遇挫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大幅度倒退。比如,南非从1960年代脱离英联邦开始,经济曾经快速发展,并保持了十几年持续发展的势头,年均增长率8%,远超韩国,当时只有日本和新加坡可以与南非的经济发展媲美。到1980年代,南非的人均GDP居非洲第一、世界前30名,基本已经步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是因为自曼德拉执政以后,坚决废除种族隔离政策,推行所谓“黑人经济振兴计划”以及“公平就业法”等,大肆迫害白人,导致白人精英群体大量移民,白人带走了先进技术和资金。黑人群体虽然获得了政治权利和更多的工作机会,但因为很多黑人无法胜任工作岗位,结果导致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一塌糊涂,经济更是大幅度倒退,现在已经从发达国家跌落为贫穷国家,2023年的人均GDP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2]其他一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同样也经历了艰难曲折甚至严重的倒退,比如伊朗、阿根廷、巴西等。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始于改革开放,基本可以说开始于1980年代。正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起步晚,所以能够充分吸收这些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并将这些经验教训运用到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中国经济学者在现代化理论问题的研究上也发表了一些有影响观点,产生了比较激烈的争论,甚至可以说形成了截然对立的两派——一派是以杨小凯为代表的“后发劣势论”,另一派是以林

毅夫为代表的“后发优势论”。^[3]应该说我们改革开放后,尤其是最近2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策略受“后发优势论”的影响比较大,“后发劣势论”因为理论基调比较灰暗,所以影响比较小。

中国当代的现代化实践的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无论从经济总量、经济总体发展水平来衡量,还是从技术突破、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来衡量,中国的现代化成绩都是一个奇迹。但是我们也应该充分认识到,在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同时,我们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同样也有很多的“后发劣势”;正因为我们对“后发劣势”重视不够,所以中国今天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暴露出诸多的弊端。

杨小凯是当代中国最为杰出的经济学者,但是可惜他英年早逝,更可惜他的很多见解不能被国内主流学界认可,所以他的理论几乎无法影响到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当中。尽管“后发劣势论”并不是由杨小凯首先提出的,但是他针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却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①“后发劣势论”的英文表达是“Curse To The Late Comer”,意思是“对后来者的诅咒”,从这个表达我们就可以看出理论提出者是带有明显倾向性和判断的。尽管杨小凯一生的抱负没能全部实现,但他提出的这些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的理论观点后来在学术界得到了充分的讨论,杨小凯也越来越得到大家的认可。

在丰富多彩的各种现代化理论中,我认为“后发劣势论”是最有价值的理论之一,尤其是对后发现代化国家具有极高的参考和借鉴价值。中国改革开放的前20年,我们比较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后发优势”曾经在中国得到充分体现。可是到最近这十几年,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达到一定高度后,我们不难发现“后发劣势”越来越突出,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比如城乡发展差距越来越大、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合理的解决等,当然这与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也有极大的关系。所以,无论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都可以在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中国可以说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又一个试验场。

总的来看,“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在非原发性现代化的国家中同时并存,在不同的国家各有不同的表现。有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能够很好的利用“后发优势”,国家的发展就比较顺,经济增长比较快,人们也能够享受到更好的福祉;而有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一味追求经济增长,或不愿遵循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则,结果导致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后发劣势”开始发威,国家发展失控、混乱,经济陷入不可遏制的停滞或倒退,前期现代化成果灰飞烟灭。一般而言,在多数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后发优势”往往在前期表现得比较突出,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各种矛盾开始凸显,“后发劣势”影响越来越大,最后导致该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停滞甚至倒退。

那么,各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关键的成功要素到底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存在很大的争议。我认为在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中,制度经济学提出的观点和建议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比如道格拉斯·诺思就特别强调产权制度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他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西方经济在近代以降之所以有突破性的发展,完全在于财产权属确定性的不断明晰。而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恰好是西欧的发展并导致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诺思虽然是总结西欧的历史发展经验,但他提出的观点应该是普适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现代化最后能否成功,制度因素至为重要。^[4]当然,关于这个问题也不能固守成见,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国情包括方方面面,比如资源环境的优劣,历史发展水平的高低,传统文化积淀的差异,甚至人种的不同等等,这些因素是很

① 杨小凯,后发劣势。2001年12月1日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第181次双周学术讨论会上的演讲。

难改变的。在如此复杂多样的背景之下建设现代化,肯定也会有极大的差异。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现代化毕竟有一些最小公约数,即无论在什么制度背景下,无论是集权的制度,还是民主的制度,或其他混合的制度,只要有这些公约数,就都有实现现代化的可能。当然,也要看机遇,更要看各国对最小公约数的利用是不是妥当。如果要问最重要的最小公约数是什么,我认为是市场经济。中国改革开放头20年之所以比较成功,实际上就是在现有体制不变或微调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利用了市场经济,不仅充分利用了国内的市场,更充分利用了国际市场。中国改革开放的巅峰时刻是进入WTO之后的十几年,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之前有了经济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积淀,包括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充分利用了现有的国际规则,表现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从经济方面看,加入WTO不仅使中国的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而且吸引了大量外资,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了中国经济结构和产业优化升级,促进了国民财富的增长。从政治方面看,加入WTO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实际上,不仅市场经济是一个公约数,即任何体制下都可以有市场经济的存在;同理,计划经济也是一个公约数,任何体制下也都可以实行计划经济。当然比较而言,无论在何种体制下,计划经济出现的问题总是越来越多。我想未来世界各国发展的趋势,应该是多种体制的融合,各自取长补短,这样公约数就会越来越多,公约数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中国的社会经济继续健康发展,中国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各项目标,那么我们无疑是向全人类展示了一种新型现代化的路径。当然,我们现在离这个目标还有比较大的距离。

有两位著名学者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出过非常好的建议,值得我们充分重视。第一位是科尔奈,他是匈牙利的经济学家,因为他提出了系统的“短缺经济学”理论,而被称为“短缺经济学家”。1999年科尔奈来中国访问,此间他对中国提出了很多忠告,兹简单列举如下:其一,不要迷信增长率。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确经济增长很快,但增长率不是唯一的目标或标准。中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应该特别关注增长率背后的质量问题,比如增长是否可持续、是否环境友好、是否社会公平等。还应特别关注人民的福利、教育、卫生、文化,这些方面才是真正反映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其二,注意缩小收入差距。中国收入差距过大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过分不公平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如资源配置失衡、消费需求不足、社会不稳定等。其三,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他建议中国应加强法治建设,提高法治水平,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市场竞争,防止滥用权力。其四,不要人为扩大国有部门。他认为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是过渡型的,而非永久性的,因为国有企业存在效率低下、竞争力弱弊端。因此中国应该缩小国有部门的规模和范围,要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不要给与特殊政策等。另外,他还提出,应该提倡自由思考的教育,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批判性思维和独立人格;不要过度干预汇率,因为过度干预并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平衡和国际关系,也不利于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注意环境保护;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不要孤立自己;不要忘记文化遗产,应该珍惜和弘扬自己的文化传统。科尔奈的这些提醒,对我们的改革和发展真是特别的重要,有些方面我们做的很好,但有些方面我们做的不好。他的忠告大多非常契合中国的实际,如果我们当时能够接受他的一些忠告,中国很可能不会走那么多的弯路。

另一位著名学者是科斯,他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开创者之一。2008年,科斯在98岁高龄的时候来到中国,他在考察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后,给中国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同样特

别好、特别重要。比如,他也建议要去除所有给予国企的那些特权,国企拥有特权是不利于经济长远发展的,同时应该鼓励私企参与自由竞争;他认为政府参与土地交易容易导致腐败,因此政府必须远离市场,中国应该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重视交易成本的降低,因为交易成本对于资源配置效率非常重要,因此中国应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和审批流程;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清晰的产权界定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础,中国应继续推进产权保护制度建设,确保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另外,他还极有远见地指出中国实行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有问题,认为在人口政策方面急需开出新的药方。

总之,“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同时并存,如何更好地发挥优势并避免劣势,是每一个国家共同面临和思考的问题。

[参 考 文 献]

- [1] (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 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2] 沐涛. 南非现代化之路及其特征[J]. 世界历史,2021(06).
- [3] 谢作诗.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硬币之两面——兼评林毅夫、杨小凯后发优劣势之“争”[J]. 经济体制与改革,2003(04).
- [4] (美)道格拉斯·诺思.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刘 浏)

The "Latecomer's Advantage" and "Latecomer's Disadvantag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ZHONG Wei-m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Tsinghua University,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development economics became an important branch of economics, which focused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nowadays, development economic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growing point of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many view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latecomer's advantage theory" and "latecomer's disadvantage theory" are the most concerned. "Latecomer's advantage theory" emphasizes that developing countries can greatly save time cost, technology cost and system cost by directly introducing capital and advanced equipment and learning from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catch up and overtake smoothly. Whereas according to "latecomer's disadvantage theory", if we blindly pursue economic growth and do not follow the general rules of modernization,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successful modernization. China'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proves the rationality of both theories. This reminds us that we should follow the general law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modernization drive in the future, and should not be paranoid or rash.

Key words: latecomer's advantage theory; latecomer's disadvantage theory; modernizatio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Yang Xiaokai